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 丛日云 卢春龙 / 主编 |

LAURA HEIN MARK SELDEN
【美】劳拉·赫茵 【美】马克·塞尔登 / 编

审查历史

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

Censoring History

Citizenship and Memory in Japa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聂露 / 译 尹钦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 丛日云 卢春龙 / 主编 |

【美】劳拉·赫茵 【美】马克·塞尔登 / 编

审查历史

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

Censoring History

Citizenship and Memory in Japa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聂露 / 译 尹钦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 / (美) 赫茵，
(美) 塞尔登编；聂露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3330 - 1

I. ①审… II. ①赫… ②塞… ③聂… III. ①侵略战争 - 研究 - 日本 - 现代
②侵略战争 - 研究 - 德国 - 现代 ③历史课 - 教材 - 编制 - 研究 - 日本 - 现代
④历史课 - 教材 - 编制 - 研究 - 德国 - 现代 ⑤历史课 - 教材 - 编制 - 研究 -
美国 - 现代 IV. ① K313.46 ② K516.5 ③ G531.3 ④ G551.6 ⑤ G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5866 号

·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

审查历史

编者 / [美] 劳拉·赫茵 [美] 马克·塞尔登
译者 / 聂露
校者 / 尹钛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责任编辑 / 姚冬梅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责任校对 / 张立生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姚冬梅
责任印制 / 岳阳
总经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印 张 / 22
开本 /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 325 千字
版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330 - 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0 - 6933 号
登记号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ensoring History: Citizenship and Memory in Japa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Laura Hein and Mark Selden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0).

Copyright © 2000 by 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Translated by arrangement with M. E. Sharp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 M. E. Sharper, Inc. 2000 年版译出

总序

丛日云 卢春龙

政治文化研究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政治学中最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也是成果最丰富的研究领域之一。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系统的心理取向，包括所有与政治相关的信念、价值和态度等。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就是“针对政治对象的取向模式在该民族成员中间的一种特殊分布”，是“内化于民众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的政治系统”。当代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英格尔哈特把政治文化定义为“与一个群体或社会流行的政治信念（beliefs）、规范（norms）和价值相关的所有政治活动”。

政治文化是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在寻找政治因果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解释变量。因而，在西方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源远流长。英格尔哈特在追溯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渊源时，曾列举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品和成果，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阿道尔诺的《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拉斯韦尔的《民主性格》（*Democratic Character*）、斯托弗的《共产主义、一致性与公民自由》（*Communism, Conformity & Civil Liberties: A Cross Section of the Nation Speaks Its Mind*）、罗基奇的《开放和封闭的精神——对信仰和人格系统性质的调查》（*The Open and Closed Mind: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and personality systems*）等。此外，一些学者还将马克斯·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列入其中。与当代科学化的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政文化研究相比，这种研究在方法论上被视为“非科学的”，但也有其重要价值。在中国，自19世纪末起，学者们在讨论中西文化关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时，也大量涉及政治文化的内容。

布林特教授曾区分和全面梳理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三大谱系，即法国的社会学谱系、德国的文化哲学谱系以及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法国的社会学谱系开始于孟德斯鸠，经过卢梭、斯戴尔、贡斯当、基佐以及托克维尔的发展而成为一个重要流派。这一流派强调从社会宏观背景的差异去理解各国政治文化的差异，进而理解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异。德国的文化哲学谱系开始于康德，经过赫尔德、洪堡、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发展而成为一个重要流派。这一流派强调解释学的传统，强调政治文化并不是对客观社会现实的抽象反映，而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象征、图腾长期积累的产物，强调从解释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历史由来。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开始于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开创性研究，这一谱系主张通过实证的、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政治文化，从而克服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弊端，他们在方法论上主张以对各国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调查为基础，进而对各国的政治文化进行精确的科学测量。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以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为主流。1956年阿尔蒙德正式提出“政治文化”概念，1963年他又与维巴合作出版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此为当代科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亦即跨民族的抽样数据研究的开端。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派伊的《中国政治的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斯里德曼的《人格与民主政治》（*Person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英格尔哈特的《寂静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的价值与政治行为方式》（*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本菲尔德的《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等。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思潮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和挑战，许多学者批评它保守、静止、简单，存在文化偏见和文化决定主义倾向，低估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作用，不具有解释力和预见性等。政治文化研究一度走向衰落，退居政治学的边缘。但是，从 80 年代起，政治文化研究经历了从“回归”到“复兴”进而走向繁荣的过程。英格尔哈特在 1988 年最早使用了“政治文化的复兴”这一概念，而后 H. J. 威尔达、阿尔蒙德和布林特等人也肯定了政治文化复兴的到来。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大批有影响、有重大原创性贡献的成果问世：英格尔哈特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 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神圣与世俗——世界范围的宗教与政治》（与诺里斯合著）（*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英格尔斯的《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 A Psycho - Social Perspective*），尤斯拉纳的《信任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普特南的《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布林特的《政治文化的谱系》（*A Genealogy of Political Culture*），狄百瑞的《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A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达尔蒙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与民主》（*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等。

政治文化研究关注政治系统的内在心理层面，强调政治文化是决定政治主体的行为准则和支配其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因此，政治文化对于了解一个国家正式制度框架下的政治行为，理解历史上一个国家特殊的发展模式，都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政治文化研究还特别与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研究有密切关系，它与经济发展、公民社会、国际环

境、政治战略、政治精英等一起，构成解释一个国家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与模式的重要的自主性变量。

政治文化研究在今天的中国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独特的文明，也是规模最大的文化单元，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在当代社会政治转型时期，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发生了何种变化？变化的方向是什么？它对于政治发展、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公民文化建设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需要当代学者作出科学的调查和分析。只有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的分布状况和变化趋势了然于胸，才能明确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道路选择，才能积极有效地推动传统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型。但是，目前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仍然以学者的观察、粗糙的文献分析为主要手段，以对传统政治文化的阐释性研究为主要内容，这种研究虽然富于学理性和启发性，但是，没有科学的量化数据为基础，也缺少可操作性，尚不足以为当前政治改革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

为了推动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需要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理论和经验，也需要直接引进西方的一些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虽然国内学界许多人都在谈论政治文化，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对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只有零星的译介，大量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对于国内学者来说还是陌生的。这是国内政治文化研究长期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

有鉴于此，我们编译了这套《政治文化研究译丛》，希望为国内学者的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我们期待着，这套丛书的出版，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政治文化研究，推动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走向繁荣，贡献出一批与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地位和独特性相称的研究成果。

序

丛日云

仅看书名，一些读者也许猜不到本书的内容。

这里的“审查历史”不是思考和研究历史，不是历史学本身的问题，它谈的是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问题，特别是中学历史教科书问题。

英文的“censoring”（审查）是“censor”（审查员）的动词形式，来源于拉丁文的“censere”，原意为“估价和课税”（to value or tax），指监察官的职位或权力。在罗马共和时代，监察官负责编定公民和元老的名册、调查财产、监督社会风纪。他们有权力对公民进行警告、劝诫和惩罚，也有权力将元老或骑士除名。在西方历史上，所谓“审查制度”（censorship）有特定含义，它出于政治、宗教、道德的考虑，决定人们应该说什么、听什么、写什么、读什么。审查的对象可以是文学艺术作品，也可以是科学和学术作品。审查者可以是政府、教会、民间团体或个人。中世纪末期罗马天主教教廷发布的著名的“禁书目录”和作者名单就是宗教审查的典型。如本书所表明的，现代的审查还超出了国家的范围，一个国家可能需要考虑其他相关国家对本国作品的审查。

本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为焦点，讨论日本、德国和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审查问题，也涉及历史课教学问题，包括日本的教科书审查（核准）制度，家永三郎的教科书诉讼，日本民族主义者修改教科书运动，德国教科书所表现的现代认同特别是超民族化取向，美国历史教科书对越战的叙述，日、韩学者和教师合作协调两国历

史教学中对日本殖民朝鲜时期历史的叙述，统一后德国的大屠杀教育，美国与日本教师如何讲述太平洋战争等。

本书主编劳拉·赫茵（Laura Hein）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温伯格文理学院历史系。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20世纪日本历史及其国际关系，特别关注经济政策的争论和各种经济理论意义的分析。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是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的荣誉退休教授、康奈尔大学的资深客座研究员，是中国、日本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政治经济与历史领域的专家。这两位历史学家都对历史记忆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们两人合编或单独出版了若干部著作研究公众的历史记忆问题。本书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

历史是一个客观的进程，但历史记忆却是人为的建构。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过去是可以改变的，因为过去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而意识是可以控制的。所以，“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1〕}换言之，控制现在的人根据其需要建构历史，形塑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而这种记忆又支配了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曾把历史比喻为“悬在我们身后的星座”，这就意味着，历史为我们今天定位，也为我们的未来指航。但历史本身并不能成为“悬在我们身后的星座”，只有一个民族集体的或个体的历史记忆才是为我们指航的星座。这个星座不是由造物主安置在自然星空的，它是由人来安置的。一个民族有自己的记忆，与其他民族不同，一个民族内部不同的群体和个体也有不同的记忆，官方记忆与民间记忆也经常存在差异和对立，这就形成了“有分歧的记忆”、“选择的传统”。归根结底，集体记忆是当代人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当代人的意识、需要、认同所支配，也会被强权人为地制造出来。那么，我们就要问：如果这个星座被人为地误置，那会发生什么？

历史记忆构成一个民族精神生命的一部分，享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民族认同的根基，但如果历史被曲解、阉割、遗忘，则意味着一个民族

〔1〕 奥威尔：《1984》，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37页。

集体记忆的扭曲和中断，一个失忆或记忆错乱的民族不可能具有健全的心智和人格。当代另一位关注历史记忆问题的犹太裔历史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把历史记忆理解为“有系统并经过反省的民族记忆”。一个民族只有保存对历史的客观完整的记忆——不仅保持着对历史的敬意与珍重，也保持着对历史的反省与批判，才能从真实的历史中得出真实的教训。选择性的历史、被阉割的历史是对当代人和后人的误导，失忆和伪造的历史则是致命的毒药。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通过历史教育建构、记忆和传承的，而历史教科书则是最重要的传承历史记忆的媒介。历史教科书具有官方性、权威性、正式性、普及性的特征，它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深深地嵌入青少年一代的精神世界，因而它是格外重要的“记忆的场所”（sites of memory），是一个民族的“体制化的记忆”（institutionalized memory）。而这种记忆又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新一代公民的认同：我是谁？我与国家或民族（国族）是怎样的关系？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如何想、如何做？如何看待与外国（族）的关系？

在国内，人们很少将历史教育与公民教育联系起来。在改革开放前，历史教育主要是意识形态的灌输，是对某种历史观的确证和展开。当这种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后，历史教育几乎等同于爱国主义教育。在西方国家和日本，中学的历史课是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而历史教科书如何写，关系到是否能够培养出具有现代视野和价值观的、充分知情的公民。这就是本书副标题所要揭示的内容：它不是简单地讨论历史教科书的技术问题、纯知识性问题和审查制度问题，它将历史教科书及其承载的民族历史记忆上升到公民身份、公民认同的高度来考察：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因而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记忆？或反过来说，某种历史记忆会塑造什么样的公民？本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历史教育，包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其对于民主社会的维系和发展至关重要。

所以，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是政治进程的一部分。二战结束的时候，盟军整肃德、日法西斯主义，对其进行民主化改造的过程中，就对其历史教科书进行审查和干预。1945年，在德国，盟军当局禁止使用纳粹

时代的历史教科书，导致学校暂停历史课教学。在日本，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一系列命令，以外科手术的方式清除战时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宣传内容。此前，全国的教师和学生已开始用墨水和剪刀删除战时教科书中“不适宜”的内容，这被称为“墨涂”（black out）。1945年9月，日本文部省按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旨意，发布详细指令修改战时教科书。到12月，战时历史教科书被全面禁止。1946年，盟军最高司令部要求日本政府审查新编的历史教科书，保证没有天皇崇拜和军国主义的内容，盟军司令部则有最后审查权。

这种对历史记忆的反思和修正常发生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典范的苏联历史教科书对于塑造苏联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起到过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展开，历史的真实面貌逐渐浮现出来，谎言被戳穿，教科书已是千疮百孔，惨不忍睹。1988年，苏联例行的16~17岁学生的结业历史考试、其他学生年终的苏联史考试不得而被取消。戈尔巴乔夫表示：“测验学生知道多少谎言是没有意义的。”1989~1990年，苏联开始启用新的教科书。这意味着，一个民族准备改弦易辙，除旧布新，就要重置“悬在我们身后的星座”。

本书所讨论的日、美、德三国的教科书问题，远没有20世纪40年代的德、日和80年代的苏联那样严重，但仍然充满着争议和批评。

争议的一个要点是教科书审查制度。就政府与历史教科书的关系，本书涉及了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政府直接控制型。对这种模式，书中只是附带提及韩国。^{〔1〕}从朴正熙时代起，那里的教科书就由国家编写发行，学生都学习同一种历史教科书。与其他三国比，韩国教科书编写体制最不自由，受到的批判、质疑却最少。由于韩国是二战的受害者，受害者如何叙述其历史似乎是免责的。在日、韩学者携手共同研究历史时也放弃了对韩

〔1〕 本书将中国也列入这一类型。参见本书第8页。

国教科书的审查。对于美、日学者来说，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我们的思考却不能就此止步。我们知道，这种由政府直接控制教科书内容的做法已成为藤冈信胜一派日本民族主义者拒绝国际批评的口实。毫无疑问，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首先负有反省的义务，需要正视侵略的历史，但受害者一方也需要正视历史，受害的经历并不能成为回避历史的理由。如果受害者不能正视历史，片面地叙述历史，与施害者隐瞒、遗忘历史一样，也会害己害人。人们还记得，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都是通过强化、夸大甚至伪造受害经历，达到了培养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仇外情绪的目的。伪造历史记忆可以使受害者变为施害者。

第二种可称为社会自主型。德国和美国属于这种模式。在战后的联邦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中央政府不干预教科书事务，出版者根据各州规定的指导原则编写教科书。根据德国的联邦制度，对教育的控制权在各州。在州一级，来自教育部、教师工会、教师和学者的代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每十年审查和修订一次课程。他们在一起共同设定主题、教学内容、教学大纲以及课程目标和范围。要经过多个利益相关方广为沟通，以征求意见和建议。在美国，一些州像德国一样，由州审查委员会决定教材的选用，另一些州则由当地的学校委员会、校长或教师个人自由选择教科书。^{〔1〕}美国没有看得见的政府权力对教科书进行审查，编写和采用历史教科书是自由的。但编写和采用某种教科书会受到社会隐性力量的影响，家长、教师和图书馆人员，出版商、教会、老兵组织、反战组织等各种社会力量也参与其中，他们都成为教科书的审查者。对教科书的编写和选择是社会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围绕教科书的争端体现为民间不同利益和观念的竞争。

第三种是政府有限控制或间接控制型。日本属于这种模式，也是本书讨论的重点。根据本书提供的线索，自19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就直接监督和审查教科书，教科书一直提供着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权威表述。二战结束时盟军责令日本政府审查教科书的做法延续了下来，只是

〔1〕 本书第7~8页。

在后来不同的时间里起到不同的作用。1953年以后，日本文部省组织一个教科书审查委员会，按特定标准对各出版商提交来的书稿进行审查，对不合标准的内容，要求进行修改。1955年，日本政府发布《教育条例手册》，明确了审查教科书的标准和规范。各地方教育委员会和学校则从文部省核准的7~8种教科书中选择一种。本书专文介绍了家永三郎的教科书诉讼，这场诉讼挑战的就是文部省的审核权。历经30年的诉讼产生了部分效果：法院裁定，政府对教科书的检查只要仅限于纠正明显的错误，就不应视为违宪，但是，当政府检查要求修改教育内容时，它就有可能违宪。这意味着，在肯定文部省审查教科书权力的同时，对其权力范围也作出了审慎的限制：文部省的修改要求必须基于历史研究方面的各种观念或者普遍接受观念。

在全球化的时代，一国的教科书如何编写，还必须考虑到其他相关国家和民族的感情，也就是说，需要国际协商。这形成教科书审查的国际机制。

在这方面，德国走在了前面。“德国的教科书是德国人内部以及德国和邻国之间复杂而广泛协商的产物。”〔1〕本书提到，德国、法国、波兰和以色列之间的联合委员会建议规范有争议的历史，并促进“旧敌”修好。德国官员和波兰政府共同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跨国讨论，旨在形成双方都认可的教科书。他们还参与了编写共同的欧洲教科书的项目。德国教育官员对来自国外的批评也作出积极的反应。比如，在以色列政府抗议德国高中课本中希特勒那部分的提纲对第三帝国的批评不够深刻后，德国重新编写了提纲。日本在这方面显得被动一些。从1982年起，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受到来自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尖锐批评，这促使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的标准，增加了“邻国条款”，要求在涉及亚洲邻国的现、当代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教科书要体现出谅解与国际和谐的精神。

如果政府有权审查教科书，它倾向于使历史教育服务于民族主义的

〔1〕 本书第143页。

目标，但在成熟的民主社会，来自社会和外部的压力要求其尊重历史。在两种力量的博弈中，日本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查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本书详尽地梳理了这个过程：战后初期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监管之下对战时教科书的改造，50年代末起政府主导的向战时教科书的倒退，60年代起家永三郎马拉松式的教科书诉讼对这种倾向的抵制，80年代起来自亚洲国家的压力。到90年代中后期，几乎所有历史教科书都写上了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朝鲜三一运动、慰安妇、冲绳岛大屠杀等内容，只是叙述的分量和分析深度还显得不够。但是，这个进步并非单向直线前进的。90年代中期起，出现了以藤冈信胜、西尾干二等民族主义者为代表的“修改历史教科书运动”，他们推出的掩盖日本战争罪行的《新历史教科书》虽然被要求大量修改，但仍然在2005年获得文部省的通过。

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审查制度，而在于其内容。作为记载和传播民族历史记忆手段的历史教科书，应该如何写？特别是涉及一国不光彩的历史时，如何向中学生讲述，这是困扰着各国历史教育者的重要问题。

最突出的一个争议是，中学历史教科书是否遵循真实性的原则，特别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战争罪行和其他丑恶行为，这成为检验教科书的一个“试金石”。所谓真实的历史，不仅意味着所讲述的历史是真实的，还包括在历史材料的选择中不能遗漏重要的历史事实。如果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被有意忽略了，那么，教科书并没有给学生一幅真实的历史面貌。日本“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许多骨干承认日本在战争中的一些罪行，但他们认为这些不宜写进教科书中。美国学者一般也不会否认美军在越战中的诸如美莱村屠杀行为，但他们的一些教科书却有意回避它们。

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的编纂不同。对于后者，需要遵循的最高原则是真实，这恐怕没有人否认。客观真实的历史应该像康德所说的“物自体”一样，虽然人们不能完全达到它，但应该尽量趋近它。但是，对中学生应该讲述什么样的历史？以家永三郎为代表的一些历史教

育者相信，“教育应该基于经过核查的事实，应该体现民主价值和和平的愿望”。^{〔1〕}但日本一些民族主义者强调历史事实与历史教育的区别，他们认为，还原真实的历史是史学家的事，但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师要作出选择，应该向学生讲什么样的历史？为了让学生成为好的国民，有些历史不宜让他们知道。美国的一些教科书作者也持这种观点。所以，越战中一些为公众熟知的史实在一些教科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述。德国虽然也有类似的观点，但主流观点认为，要让孩子们知道真实的历史，这对于塑造现代公民非常重要。

的确，历史教育不是历史研究，它是公民教育的内容。历史教科书内容的选择，实际上是以对更为重要的问题的理解为依归，那就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

二战后，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监督下，日本新编的历史教科书遵循三个原则：没有任何宣传；没有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或传播神道教；增加对普通人在经济、发明、学术和艺术方面的成就的论述，只有在天皇有突出的贡献时，才可以提到天皇。^{〔2〕}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教育与军国主义国家战争教育的区别。

虽然本书所考察的三个国家都已经是民主国家，德国和日本已告别了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时代，教科书的价值基础是自由和民主，极端的民族主义没有了市场，但围绕教科书内容的争议表明，历史教育的目的仍是令人焦虑的问题。历史教育应该是民族主义的，还是超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抑或是在两者间实现一种协调？是为了服务于塑造现代公民，还是要适应全球竞争和国家的需要？如何在培养公民的爱国精神（热爱民族历史遗产、民族自信与自尊）与其保持清醒理性和尊重事实之间达至一种平衡？在历史教育中提倡质疑精神会损害学生对国家的忠诚吗？

在日本，相关的争论在战后一直持续着。由盟军司令部奠定基础而

〔1〕 本书第 100 页。

〔2〕 本书第 101 页。

由以家永三郎为代表的一派人坚持的观点认为，教育应该以公认的历史事实为依据，要让年轻一代了解本国历史上的污点与罪行，历史教育应该体现民主的价值与和平的愿望。但是，这个观点不断受到民族主义倾向者的挑战。民族主义者认为，学校是专门培养日本公民和对其进行社会化的场所，所以不应传授那些让学生质疑和羞愧于自己的日本身份的知识。他们公开肯定历史教育应该服务于民族的利益，目的是培养学生坚强的国家意识，对国家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所以，历史应该像国旗一样，发挥意识形态的核心作用，通过它来使日本人成其为日本人，紧密团结，一致对外。根据他们的理解，历史是“国民认同计划”的一部分，是“光明的历史”，而不是反日本的、自虐和取悦于外国人的历史，它应该是培养国家意识所需的各种传说和故事的集合。^{〔1〕}

美国虽然没有国家审查制度，历史教科书不受国家的直接控制，但大多数教科书自觉地遵循官方的民族主义叙事方式，其出发点仍然是将历史教育作为培养公民爱国意识的工具。不过，没有国家权力干预也使美国的教科书具有多元化特点。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也没有受到来自国外的挑战，但美国学者对其提出了强烈的责难与拷问。如本书所表明的，一些美国学者对教科书关于越战历史的叙述提出了近乎苛刻的批评，几乎将越战中的战争罪行与德、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暴行等量齐观。他们批评一些教科书对越南战争中战争罪行的轻描淡写，包括美莱村屠杀、老虎笼、毁灭性的轰炸和对越南的环境破坏等，也指责许多教科书没有深入分析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合法性、没有引导学生质疑政府的决策：是正义战争还是肮脏的战争、毫无必要的暴行？是政策失误还是“战争犯罪”？甚至指责教科书没有对北越做更多的正面描写，究问某些广为人知的著名的战时照片为何没有被采用；等等。他们相信，如果美国青年一代不能在历史教育中了解真实的历史，学会独立思考和质疑政府的政策，就不能防止政府重蹈覆辙。

在三个国家中，德国教科书的内容和指导原则是受到作者肯定的。

〔1〕 本书第85页。